

· 社会学研究 ·

# 1943年鲁西冀南特大灾荒下的农民生活

徐 畅

(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山东 济南 250100)

[摘 要] 1941年春至1943年夏,鲁西冀南连续3年遭遇特大旱灾。1941、1942两年粮食严重减产,1943年春季作物因无雨未能播种,秋收绝产。由于旱灾、蝗灾、水灾接连打击,以及日、伪、匪、顽疯狂掠夺,鲁西冀南灾荒在1943年达到顶峰:老百姓忍饥挨饿,吃糠咽菜,身体浮肿,饿殍遍地,死尸盈野。为了生存,老百姓卖房卖地,卖儿卖女卖妻,流落四方,逃荒要饭,受尽了人间的苦难。

[关键词] 鲁西冀南;灾荒;农民生活

[中图分类号] K265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1-3842(2017)01-0135-10

自1939年起,尤其是1941年之后,鲁西冀南<sup>①</sup>自然灾害不仅接连不断,而且灾情极为严重。1941年春秋雨量不足,全年粮食歉收。1942年春季无雨,夏秋连旱,入冬无雪。1943年春天仍旧不下雨,大地龟裂,河道干涸,鲁西冀南遭遇了百年少有的特大旱灾。天旱易生蝗虫,勉强没有旱死的庄稼,春秋天又遭了蝗灾。严重的旱灾使得春苗几乎完全枯死,麦季庄稼几近颗粒无收。入秋之后,连下七天七夜的大雨,沟满河平,房倒屋塌。恰在此时日军决溃卫河和滏阳河河堤,冀南30余县被淹,平地一片汪洋。由于旱灾、蝗灾、水灾接连打击,以及日、伪、匪、顽疯狂掠夺,鲁西冀南灾荒在1943年达到顶峰:老百姓忍饥挨饿,吃糠咽菜,身体浮肿,霍乱流行,饿殍遍地,死尸盈野。关于鲁西冀南老百姓特指为“灾荒年”的1943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,有关论著虽有涉及<sup>②</sup>,但较为简略。本文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,从吃糠咽菜、卖房卖地、卖儿卖女、逃荒要饭等方面,力图真实地再现灾荒期间老百姓的生存实态。

## 一、从吃糠咽菜到“食人肉”

近代以来,即使没有战乱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,鲁西冀南农民生活都十分拮据,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双重打击下,生活困难到了极点。麦面平时难得一吃,灾荒年间自然绝迹于食谱,高粱、玉米、小米等日常主食也基本断绝,老百姓只能以树叶、树皮、草籽、果壳、籽饼、蚂蚱等等果腹充饥。

我们先看两条文献记载。据杨易辰对冠县观察,1943年灾荒期间,一般的“富农、富裕中农也仅是十分之一二的粮食支持,十分之七八是树叶和糠”,贫穷的老百姓只能“吃红薯梗、叶藜、秆草,

[作者简介] 徐畅,历史学博士,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① 本文所谓“鲁西冀南”,是指津浦路以西、平汉路以东、德石路以南、漳河以北,以河北馆陶至山东德州卫运河为中心的鲁西北和冀南平原地区,包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区 and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鲁西北地区。

② 参见齐武:《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—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57年版,第157—162页;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:《冀南革命斗争史》,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1996年版,第253—257页。

于是人死亡率就大了,路上死尸遍地,家里躺的也是死人”<sup>①</sup>。

何林青这样描述邱县的情形<sup>②</sup>:

1943年一春无雨,春苗没有种上,多数农户家的余粮吃完了,全县人民面临着饥饿的严重威胁。灾民开始吃棉花籽,吃豆饼,后来挖野菜,摘树叶充饥,野菜、树叶吃光了,都又抢着去刨树根,剥树皮充饥,凡能吃的树皮(除松柏以外),几乎都被剥光。……

再看老百姓的叙说。

冠县烟庄乡烟庄魏芳岐<sup>③</sup>:

1943年天旱,高粱都是瘪子,玉米一点儿大,麦子没耩上,老百姓吃树叶子,榆树叶、柳树叶、白毛杨叶,枣树叶不吃,槐树不吃,不好吃。

馆陶县柴堡乡林西霍吴氏<sup>④</sup>:

过了麦,春庄稼,蚂蚱把高粱咬了,拿着口袋在地上撵,把头掐了,肚子挤了吃。是树叶就吃,枣树叶吃起来辣乎乎的,柳树上的柳穗好吃。

清河县葛仙庄镇桥东办事处黄金庄工作站郎吕坡村<sup>⑤</sup>:

那时候光吃点野菜,将灰灰菜,马蜂菜,有面子(榆树皮面)就长(加)点面子,没面子就那样吃。扒榆树皮,轧成面子,用大锅煮,黏糊的,榆树皮黏糊糊的,再长点野菜。肚子里没粮食,要不光死人啊!

邱县旦寨乡鲍庄邢同杰<sup>⑥</sup>:

灾荒年,除了粪,啥也吃,就是没吃过粪!没一点吃的,拣了这树叶,拣了这野菜,弄回来就吃,都饿死了。我没点啥吃,摸着啥就吃啥。嚼花生皮,搓搓,硬咽。那瘦得不行了,后边不出去就饿死了。

威县七级镇大里罕村李庆堂<sup>⑦</sup>:

没雨,没下雨,树头叶子都吃光了,地里青草没有了,野菜也吃光了。剃的剃了,煮的煮了,树叶、椿树叶、枣叶都吃了。

临西县摇鞍镇南杏园张生良<sup>⑧</sup>:

蚂蚱多,枕头大的布袋一摸一布袋,把锅烧热,也不放水,烙一烙吃那个。

1943年灾荒期间,“人吃人、狗吃人”在老百姓的口中已经不是什么特别让人震撼的事情了。

我们看老百姓自己是如何诉说的。

邱县旦寨乡西大省庄梁保军<sup>⑨</sup>:

民国32年,我13岁,人吃人的年景。我们村里有人吃人肉的,先挖腕,后挖大腿,连骨架都推回去,煮着吃。

①杨易辰:《冠北工作队总结》(一九四五年一月),谢忠厚主编: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》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4年版,第107页。

②何林青:《我对丘县大灾荒的回忆片段》,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:《丘县文史资料》第1辑,内部发行,1993年,第192页。

③魏芳岐,男,75岁,冠县烟庄乡烟庄村民,2010年10月3日访谈。

④霍吴氏,女,82岁,馆陶县柴堡乡林西村民,2010年7月16日访谈。

⑤黄秀银,女,85岁,清河县葛仙庄镇桥东办事处黄金庄工作站郎吕坡村村民,2008年1月24日访谈。

⑥邢同杰,男,80岁,邱县旦寨乡鲍庄村民,2010年5月4日访谈。

⑦李庆堂,男,85岁,威县七级镇大里罕村村民,2008年1月25日访谈。

⑧张生良,男,80岁,临西县摇鞍镇南杏园村民,2008年9月3日访谈。

⑨梁保军,男,77岁,邱县旦寨乡西大省庄村民,2010年5月4日访谈。

曲周大河道乡西大由村冀清朝<sup>①</sup>：

俺庄往南一个胡同的老人死了，有人把他腿上的肉割下来，吃他肉的那个人噎死了。

冠县梁堂乡后何仲牛宝贤<sup>②</sup>：

民国32年，大概是秋天，当时我穿夹衣裳去要饭。道上尽是要饭的，我亲眼见过一个老太太躺在马路上，还没死，狗就咬，她还拿着棍子打哩！

由于长期吃不上粮食，始终处于饥饿状态，营养失调，老百姓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齐武形象地描述了1943年春天冀南游击区大名、成安、魏县一带老百姓的状况：

在那里，毁身销骨的生活苦难，使人们的状貌都变得不同于常人。他们大都头大颈长，瞠目咋舌，踉跄而行，骑步而立。人们的劳动能力已全部丧失，不仅田间操作无法进行，就是运碾推磨，担物取水，也不能胜任。每当日出时，饥饿的人群相率斜倚仰卧，在街巷间晒太阳，很多人就在这种昏睡状态中死去。<sup>③</sup>

鲁西冀南老百姓虽然没有文学色彩，但是朴素、简单的语言同样极具震撼力。

冠县万善乡宋村宋郭氏<sup>④</sup>：

灾荒年的时候连旱三年，地里没井，还刮大风，那时候太难过了。一点雨也没下，粮食没有，都吃树皮、南瓜秧，东躺一个，西躺一个，饿死了不少，有不少逃荒的。

曲周县槐桥乡刘郭屯姚玉芹<sup>⑤</sup>：

民国32年没啥吃，人都得了腿肿，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，蚂蚱来了，地里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俺们都受罪了。吃槐叶、荠荠菜、榆叶。有的饿得出去逃荒，都没回来。饿死的人很多，那会儿没医生，腿胀得皮都裂了。

临西县下堡寺镇宋子垆高玉琴<sup>⑥</sup>：

那几年一点粮食不收，那一年人饿得面黄肌瘦，饿死了很多人。蚂蚱多得一呼拉一捧，使布袋弄家去，烧个干锅，都扑棱扑棱的，蚂蚱烙红了吃，吃得大手都解不出来。

## 二、从卖房卖地到卖儿卖女

灾荒期间，一则树叶、树皮、草籽、花籽饼等等能以下咽的东西逐渐被吃光，二则完全不吃粮食也只有死路一条，于是老百姓开始变卖一些能够变卖的东西，先是出卖衣服、桌椅板凳、箱柜、犁耙等日用品，继而拆毁房屋，出卖砖瓦、木料，再则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。还不能生存，就只有卖儿卖女卖妻了。总之，为了活命，凡是能够卖得出去的，无不尽相出售。由于卫运河两岸普遭灾荒，除土地或卖给当地富户，或外来人购买外，从人到物往往只能卖往外地，尤其是卖到东平、金乡、鱼台、嘉祥、梁山等基本没有遭灾的地区，于是鲁西冀南通往非灾区的大路上人流不断，挤满了手推衣服、门窗、檩条小车的灾民。

我们先看文献记载。南宫县老百姓“先靠树皮、野菜、秕糠等物度日，后靠借高利贷和赶集卖牲口、衣物、家什买粮糊口，甚至有许多人家被迫拆房毁屋卖木头度荒”<sup>⑦</sup>。邱县老百姓“为了度荒，

<sup>①</sup>冀清朝，男，79岁，曲周县大河道乡西大由村村民，2010年5月4日访谈。

<sup>②</sup>牛宝贤，男，91岁，冠县梁堂乡后何仲村民，2010年10月2日访谈。

<sup>③</sup>齐武：《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—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，第163页。

<sup>④</sup>宋郭氏，女，91岁，冠县万善乡宋村村民，2010年10月5日访谈。

<sup>⑤</sup>姚玉芹，女，76岁，曲周县槐桥乡刘郭屯村民，2010年5月3日访谈。

<sup>⑥</sup>高玉琴，女，84岁，临西县下堡寺镇宋子垆村民，2008年9月3日访谈。

<sup>⑦</sup>中共南宫市委、市政府编：《冀南抗战红都南宫》，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97页。

灾民变卖生产农具,衣服被褥、柜箱,桌椅板凳等。浮财卖光了,就拆房卖屋,廉价卖地”<sup>①</sup>。南乐“200斤粮食就能换一处四合院,30斤粮食可买一亩耕地”<sup>②</sup>。临西老百姓“把衣服、农具、牲畜、拆房的木料弄到集市上去卖。一张犁换两个窝窝头,一根大梁换几斤粮食;有的群众忍痛卖地。旱情持续发展,财产、土地再也没有人买”了<sup>③</sup>。

我们再看老百姓的诉说。

冠县柳林镇崔庄崔子明<sup>④</sup>:

民国31年没耩上麦子,32年旱。吴连杰的兵在春天抢粮,把种子抢走了。没吃的,穷得卖树,卖房子,一座房子才卖50斤粮食,吃了这个没法了,逃到黄河南,也有到关外的。

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王天齐<sup>⑤</sup>:

过贱年,灾荒年,民国32年逃荒,上年纪的、妇女留下,年轻力壮的走。大部分都是到南边,上黄河南,到东平县,用小推车把衣服、檩条这些东西推去卖,换粮食,回来养活家里。次一点的全家要饭,把孩子送人。

馆陶县馆陶镇安静张兆先<sup>⑥</sup>:

民国32年阴历三月逃的荒,用小推车,推两扇门,带点衣服,到黄河南换点粮食吃。

威县固献乡韩庄韩春生<sup>⑦</sup>:

上山东茌平,俺这往东里几里地就是山东了,逃了240里地。那时都十来多岁了,我跟着俺爹推着小车去的。我没在那儿住,到那儿卖了东西再回来。家里的东西,方桌,椅子,都卖了,换粮食吃。

灾荒期间为了活命,贫苦的老百姓纷纷出卖土地。例如鲁西北冠县田村百十户人家,因度荒卖地的有85户,其中王振友等16户把田宅卖光,寸土未留。贫农吕同有不仅把自己的土地卖光,还将5户外逃的近族邻居家20多亩地卖光吃光。由于老百姓纷纷出卖田地,富户趁火打劫,价格被压得极低,最初1亩地能换1斗或2斗粮食,后来2斤馍馍甚至1斤麦面条就卖掉1亩地。中农吕连耕每卖1亩地吃两顿饭,吃了40顿饭就把20亩地卖光了。索庄一家地主从班庄一个村,就买了20顷地<sup>⑧</sup>。冀南同样如此,为了生存,老百姓“典卖土地求生者比比皆是,但土地典卖之价格为数寥寥(有的几个窝窝即换地1亩)”<sup>⑨</sup>。有资料称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的耕地约有50%,中农耕地下降也有30%<sup>⑩</sup>。

关于卖地度荒,老百姓记忆深刻。

清河县谢炉镇孝义屯村宋孟贤<sup>⑪</sup>:

①何林青:《我对丘县大灾荒的回忆片段》,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:《丘县文史资料》第1辑,第192页。

②中共南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:《中国共产党南乐县历史》(第1卷),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版,第189页。

③陈广亭、陈祖诗:《临西根据地人民战胜一九四三年大灾荒》,临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:《临西文史资料》第2辑,1989年,第58—61页。

④崔子明,男,78岁,聊城市冠县柳林镇崔庄村村民,2006年10月5日访谈。

⑤王天齐,男,77岁,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民,2007年1月29日访谈。

⑥张兆先,男,78岁,馆陶县馆陶镇安静村民,2008年8月30日访谈。

⑦韩春生,男,79岁,威县固献乡韩庄村村民,2008年1月28日访谈。

⑧司洛洛:《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》,谢忠厚主编: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》(下)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1年版,第911页。

⑨《冀鲁豫、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》1944年8月10日,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: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》第二辑“文献部分”(下册),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8年版,第319页。

⑩司梳亚:《回忆1942年冀南大灾荒》,中共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:《大名烽火》,1997年,第200页。

⑪宋孟贤,男,96岁,清河县谢炉镇孝义屯村民,2008年1月27日访谈。

民国32年是大灾荒,村里没人了。土地都卖了,没有吃的,卖了土地换几斤粮食。卖给那些富裕的人,十几斤小麦换一亩土地。

邯郸市邱县旦寨张省庄张辛海<sup>①</sup>:

卖地,卖宅子,卖小孩,卖老婆。二斤小米一亩地,两个窝窝头一亩地。

邱县香城固镇东赵屯赵舒信<sup>②</sup>

地都卖光了,二斤窝窝一亩地,一斤小米一亩地卖给地主家里,村里的地主。

本来是重人伦、重乡情、重道德的鲁西冀南乡土社会,像中国历史上大的灾难来临一样,在1942至1943年灾荒期间,为了活命,父子不相顾,夫妻不相恤,父卖子,夫卖妻,人口买卖十分盛行。

人口买卖又主要分成两种情况:一是卖女人。例如馆陶马店“成为人市,大部分都是女的,有饭吃就跟人家走,一个花生饼都能领回一个媳妇”<sup>③</sup>。在“临清人市,净卖女的,上(黄)河南,拣好女的都给带走了,给人家当媳妇去了”<sup>④</sup>。有的怕遭人谴责,说媳妇是妹妹就卖了。有的年轻夫妻逃到他乡,讨饭要不上来,丈夫把妻子嫁给他人,而自己就近当苦力。有的母女同嫁一家父子,还有的母亲改嫁不让带儿子,把儿子给人当养子。还有女性自己卖自己,头上“插个草,自卖自身,谁个给她买点馍,买个窝头,就跟着走了”<sup>⑤</sup>。据李方炎回忆,1943年春天,他看到大名县九仙庙集上,有“很多卖小孩的,还有十七八岁的姑娘头上插上谷草表示出卖”,“一个馒头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”,“女的要说你管她吃饭便可以给你作老婆”<sup>⑥</sup>。有的“妇女沿村找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”<sup>⑦</sup>。冀南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:“针穿黑豆上街卖,河里水草上称称。二十多的小寡妇,倒贴光棍两烧饼。十七八的大姑娘,不值三文或两文。四五十岁的老嬷嬷,捋巴捋巴(随意)填粪坑”<sup>⑧</sup>。总之,当时妇女买卖十分盛行。据不完全统计,冠县桑阿镇附近的大花园头村,32名青年妇女改嫁他乡<sup>⑨</sup>,很多妇女“都行(嫁)到河南(黄河以南)那里了”<sup>⑩</sup>。灾荒期间巨鹿阎瞳公社卖妻子的403人,卖子女的801户,妻离子散的4824户,卖儿卖女的3992户<sup>⑪</sup>。据对1943年8月邱县2、3、4区不完全统计,476对夫妻离散、改嫁他乡,702户卖儿卖女<sup>⑫</sup>。

二是卖子女是当时又一非常突出的现象。灾荒期间鲁西冀南的老百姓都“上黄河南、东平州逃荒,很多人都把孩子卖了,男孩卖给人家当儿子,女孩卖给人家当二房”<sup>⑬</sup>。卖小孩“头发长满才

①张辛海,男,78岁,邱县旦寨张省庄村村民,2007年5月5日访谈。

②赵舒信,男,81岁,邱县香城固镇东赵屯村民,2007年5月5日访谈。

③崔金荣,女,83岁,馆陶县南徐村乡后李八寨访谈,2010年9月1日访谈。

④殷金友,男,69岁,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养老院村民,2007年1月30日访谈。

⑤武清江,男,78岁,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村村民,2008年9月1日访谈。

⑥李方炎:《大名一带抗战时期的片段回忆》,中共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:《大名烽火》,1997年,第97页。

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:《太行区一九四二、一九四三两年的救灾总结》,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,卷宗号:576-1-33-25。

⑧刘春林,男,81岁,曲周县曲周镇西刘庄村民,2010年5月6日访谈。

⑨谢忠厚主编: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》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1年版,第289页。

⑩邵汝臣,男,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,2007年1月29日访谈。

⑪崔维志、唐秀娥主编:《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》,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3年版,第220—221页。

⑫何林青:《我对丘县大灾荒的回忆片段》,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:《丘县文史资料》,第1辑,内部发行,1993年,第192页。

⑬郭秀芳,女,86岁,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办事处端庄村民,2010年10月3日访谈。

能卖得掉,一个窝头就能换一个孩子”<sup>①</sup>。邱县胡延年的二弟就只卖了一个绿豆窝窝头<sup>②</sup>。小女孩“都领走了,给了有饭吃的人家,给点吃的就行”<sup>③</sup>。人贩子还不是小孩就要,“能走路的人家要,不能走路的不要。”<sup>④</sup>事实上,村庄里、逃荒的路上,四处扔的都是小孩。例如临西县摇鞍镇东郭七寨村杨秀芹说:“出去逃荒,路上扔得净小孩,都管不了。爹他娘抱着小孩,走不动了,小孩就扔了。”<sup>⑤</sup>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一村石怀亮回忆说:“我记得那个小孩啊,俺村扔的可街都是。只要有人给小孩买个馍馍,买个啥,小孩在那儿吃,大人就走了。”<sup>⑥</sup>邱县邱城镇贾街贾盛春说,他看到逃荒的人“担着小孩,扔那儿了,都不要了,大人走了。小孩还在那坐着,有的还不会跑呢,哭,坐在那儿‘哇哇’地哭。”<sup>⑦</sup>虽然父卖子、母卖女、丈夫卖妻子、自己卖自己的现象处处可见,但实际上可能是不得已的“两全其美”之法:妻儿子女卖给了人家,多少有口饭吃,可以活命;而父母或丈夫多少得了一点粮食,暂时不至于饿死。事实上在父母不能养活子女,丈夫不能照顾妻子,走投无路的情势下,与其说是卖儿卖女卖妻,不如说是给老婆孩子找条生路。

### 三、从安土重迁到流落四方

农业社会居民的重要特征之一,就是安土重迁,鲁西冀南乡村老百姓也是如此。由于食物严重缺乏,呆在家里等于求死,于是从1942年开始,鲁西冀南老百姓纷纷背井离乡,扶老携幼,外出逃荒,下(黄)河南、走山西、闯关东,大规模逃荒要饭。老百姓逃荒要饭1943年春秋达到高峰,持续到1944年春天,此后大规模逃荒基本结束。

1942至1944年,尤其是1943年鲁西冀南老百姓的逃亡数目巨大,规模惊人。据灾荒之后调查,冀南逃亡率一般占人口30—50%,重灾区最高者达90%<sup>⑧</sup>。据陈再道回忆,仅冀南全区“外逃的一百多万人”<sup>⑨</sup>。大名“大批地死人,大批人外逃,封门闭户。一些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,荒凉一片”<sup>⑩</sup>。据调查大名一区逃亡者达60%<sup>⑪</sup>。截止1943年7月,馆陶仅卫河以西几个区外出讨饭就达几万人<sup>⑫</sup>。清河县外逃人数约2万余人,唐口是个百户小村,外逃者300多人<sup>⑬</sup>,黄金堤村500余户逃亡百余户<sup>⑭</sup>。据1959年巨鹿阎瞳公社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,进行逐户逐人回忆,1943年逃荒在外者13223人,小吕寨镇大吕寨村逃荒的近50户,西郭城乡柳洼村55户逃荒,全县外出逃

①王新章,男,77岁,曲周县曲周镇袁庄村村民,2010年5月6日访谈。

②胡延年:《1943年大灾荒我家的悲惨遭遇》,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:《丘县文史资料》第1辑,内部发行,1993年,第192页。

③杨宗芹,男,78岁,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民,2010年7月11日访谈。

④王同春,男,83岁,曲周县侯村镇广下村民,2007年5月6日访谈。

⑤杨秀芹,女,78岁,临西县摇鞍镇东郭七寨村村民,2008年8月30日访谈。

⑥石怀亮,男,74岁,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一村,2007年5月4日访谈。

⑦贾盛春,男,82岁,邱县邱城镇贾街村民,2007年5月3日访谈。

⑧齐武:《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—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57年版,第164页。

⑨陈再道:《陈再道回忆录》,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2009年版,第349页。

⑩康敏:《大名县历史情况回忆》,中共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:《大名烽火》,1997年,第115页。

⑪⑫稷门孤愤楼:《秦庭泪痕》,上海启明书局,1943年,转引自崔维志、唐秀娥主编:《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》,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3年版,第182—183页,第182—183页。

⑬河北省馆陶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馆陶县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9页。

⑭中共清河县党史研究室编印:《清河革命斗争史》(1934—1949),1995年,第108—109页。

荒要饭者67978人<sup>①</sup>。邱县倪宋一个村逃荒860人<sup>②</sup>。南宫县逃亡12387人<sup>③</sup>。聊城逃荒者达64%<sup>④</sup>，有的村庄逃亡极其严重，例如冠县定远寨乡三庙村280户逃荒，剩10来户<sup>⑤</sup>。以桑阿镇、辛集、堂邑为中心鲁西北大地上，尸横于野，树无绿叶，户无炊烟，呈现出一幅人类洪荒景象。

数量如此庞大的灾民，到哪里去逃荒呢？大致说来有三个方向：一是少数家境稍好者，在变卖家产房屋后，携儿带女逃亡东北辽宁、吉林一带农村种地谋生；二是一部分人一家老少，逃到山西条件较好的地方，靠乞讨或找临时短工苦力谋生，这种情况冀南西部较多；三是大多数人“去不起东北，就上黄河南了”<sup>⑥</sup>。灾民们扶老携幼，带着家中仅有的一点衣物、家具等杂物，逃到黄河南的东平、梁山、嘉祥、鱼台、金乡等一带较为丰收的地区，用物品兑换一点粮食吃，年轻的打短工，做临活，老弱妇孺只好依靠乞讨度日。去山西和东北路途遥远，一般去后很长时间才回来，而黄河南距离较近，实际情形是很多灾民往还于家乡与逃荒地点之间。例如冠县烟庄乡烟庄赵怀元说，他“逃荒到黄河南，买了东西卖东西，卖了东西再买东西，来回跑，从家拿布、衣裳卖了，再买麦子回来”<sup>⑦</sup>。馆陶路桥镇油寨国之起说：“村里有500人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逃荒去了，都去阳谷、寿张，去黄河南了。我父亲推着小车，去寿张换点粮食，再回来拿粮食换点家具、衣服，再拿这些东西去换点粮食，来回倒腾，弄点粮食养家”<sup>⑧</sup>。

我们还是看看老百姓自己详细诉说吧。

冠县辛集乡史庄张玉珂<sup>⑨</sup>：

民国32年逃荒的人很多，那一年饿死了三分之一，这里是无人区。我的父亲是中医，背药箱去黄河南看病，都不在家。我也跑了，32年走的，把门和蚊帐都拉到黄河南去卖。母亲老了，没有出去，在家，和婶子一起住，她在家吃树叶子、糠。逃荒的人，下黄河南的多，就是梁山那一带。有的逃走了又回来了，也有女的直接行（嫁）到黄河南，都是十四五岁啊。我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，当时还写过“南跑北走东西奔，不知何处是故乡”这类的句子呢！

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办事处五里屯刘玉振<sup>⑩</sup>：

民国32年，那是贱年，地里不见庄稼，旱，没水。拆自家的房子上黄河南卖，换点粮食吃。夏天里推着上河南，带着孩子，全家出去，一个檩条子能卖几块钱，一次弄去好几根，卖了再买点粮食回家。卖一回，回家撑几天。

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武富斋<sup>⑪</sup>：

民国31、32年都旱，挨饿。逃荒要饭。到关外，到东南，到寿张、梁山好一点了。西边那几个村都逃尽了，我也逃了，十四五岁的时候。32年过了秋，在家没吃的，就逃荒要饭，秋后就逃荒了。秋后下雨，麦子耩上了。34年回来了，到麦口了，就回来了。

①崔维志、唐秀娥主编：《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》，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3年版，第220—221页。

②何林青：《我对丘县大灾荒的回忆片段》；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：《丘县文史资料》第1辑，内部发行，1993年，第192页。

③《冀南第四专署南宫县八年敌祸调查统计表》，中共南宫党史研究室编印：《南宫风云录》第2辑，1986年，第340页。

④谢忠厚主编：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》，第289页。

⑤徐洪祥，男，80岁，冠县定远寨乡三庙村民，2006年10月3日访谈。

⑥邵汝臣，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，2007年1月29日访谈。

⑦赵怀元，男，97岁，冠县烟庄乡烟庄村民，2010年10月3日访谈。

⑧国之起，男，82岁，馆陶县路桥镇油寨村村民，2010年9月3日。

⑨张玉珂，男，85岁，冠县辛集乡史庄村民，2010年10月4日访谈。

⑩刘玉振，男，92岁，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办事处五里屯村民，2010年10月3日访谈。

⑪武富斋，男，83岁，馆陶县柴堡乡八义庄村村民，2010年9月1日访谈。

清河县坝营镇张家庄张本道<sup>①</sup>：

民国32年灾荒，在家吃不上饭，逃荒到济南。灾荒年村里没人了，天旱，没收东西，都饿死了。家里有父母亲、奶奶、兄妹四个，都逃荒到山东济南，打工要饭，吃花生饼。村里都饿得没人了，村里一片荒地。

由于人口大量逃亡，鲁西冀南出现了“无人区”。冠县至堂邑公路两侧，马颊河两岸，涉及1000多村庄，约40万人口，形成骇人听闻的“无人区”。杨香圃、魏长捷对堂邑“无人区”回忆说<sup>②</sup>：

“无人区”和“半无人区”里的村庄灾民，因断粮，不少人活活饿死在屋里、路旁、地头……。有的村庄死人无人理，任其腐臭，其惨状目不忍睹。造成田地荒芜，野草丛生，长草半人高，灾民没粮吃，只好打草籽，挖野菜，捉野兔充饥。

亲历者王萍回忆1943年堂邑“无人区”时，这样写道：

提起无人区，实在骇人听闻，触目惊心。……我们趁着惨淡的月色，走过这块无人区。一路之上听不到狗吠鸡鸣，连那生命力极强的小鸟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万木萧瑟，寒风嗖嗖，死一般的寂静。“平野有千里，居人无一家”，似乎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，只有我们这支队伍，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南行进。

太阳从东方升起了，鱼肚色的大地染着缕缕红霞，我们这支队伍才“在无人区的南端堂邑县城西北驻下。找房东可就困难了，十室九空，杳无人烟。我们一连走到几个院落竟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。有的炕上一领破席，掀开后下面是一具尸骨。有的尸体还未完全腐烂，惨不忍睹。”<sup>③</sup>

冀南由于上百万人逃亡，“无人区”情形虽然没有鲁西严重，但也十分可怕。例如临西1943年秋天，村庄、田野被野草吞没，连村子里的街道、院子，房顶、锅台上都长满齐人高的臭蒿子、野草。偶尔几个逃荒回来的群众，随地挖个坑埋掉死在家里的亲人，又去逃荒<sup>④</sup>。又如邱县百户寨原有200多户，千把口人，1943年一下子就减少700余人，村里几乎家家满蒿草，户户有饿殍<sup>⑤</sup>。亲历者齐武生动描述了夜间冀南村庄的情形<sup>⑥</sup>：

在这里，很少遇到什么活的生物，只有老鼠算是例外。由于食物奇缺，这些潜伏在地下的动物，也发生了饥荒。夜间行军的时候，人们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，像波浪一般滚滚移动，那便是转移就食的鼠群。据事后调查，这类地区人民的死亡率，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五；逃亡者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。敌占区的重灾区，几乎整个整个的村庄，都被饥饿和疫疾扫光。人口死亡率，最高者达百分之四十，逃亡率最高者达百分之九十。

#### 四、结语

1943年前后尤其是1943年，鲁西冀南老百姓大量死亡。例如据调查，1943年冠县赵庄120户750人，绝户6家，死亡200人；火烧营70户334人，绝户33家，死68人；陈庄130户800人，绝户

<sup>①</sup>张本道，男，83岁，清河县坝营镇张家庄村村民，2008年1月26日访谈。

<sup>②</sup>杨香圃，魏长捷：《回忆堂邑“无人区”》，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印：《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》，1992年，第314页。

<sup>③</sup>王萍：《跟随宋任穷同志的一段回忆》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宋任穷纪念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9年版，第215页。

<sup>④</sup>陈广亭、陈祖诗：《临西根据地人民战胜一九四三年大灾荒》，临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临西文史资料》第2辑，1989年，第61页。

<sup>⑤</sup>孙书书等：《王任重任百户寨》，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丘县文史资料》第1辑，1993年，第11页。

<sup>⑥</sup>齐武：《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—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》，第164页。

15家,死120人<sup>①</sup>。又据调查,截止1943年底,冠县贾镇以东63个村庄成为无人区,死亡民众2.11万人。其中桑阿镇周围33个“无人村”1.1万人<sup>②</sup>。1942年灾荒前,堂邑县(今属冠县)25万余人,灾后统计18万余人,死亡与外流者7万余人<sup>③</sup>。又如莘县1943年全县饿死2万余人,有的村庄出现地无人种、村无人住的景象<sup>④</sup>。张怀轩对冠县当时的情形这样描述道<sup>⑤</sup>:

几十里的农村都望断炊烟了。遍地蓬蒿,村无树木,路无行人,狐兔满街,有的住在灶坑或坑洞里,人的生命已微弱到极点,勉强行动的人,个个腊黄脸色,脖子长,大眼球凸出,细脚伶仃,一阵风就可吹倒,老少走路不离拐棍,一步挪不了半尺。有的为了在少皮无叶的树下利用稀疏的阴影养一下气力,两眼一合就昏昏睡去,再也不会醒来;有的一步踉跄拌个跟头就离开了人间。那时在草丛中,房角里,水井边,路旁到处都可以发现饿死的尸体。

冀南如同鲁西,1943年前后人口大量死亡。例如据1959年巨鹿县阎瞳公社逐户逐人回忆,1943年饿死4883人,其中小吕寨镇大吕寨村共饿死117人,西郭城乡柳洼村饿病死亡230余人,绝户8家<sup>⑥</sup>。1942年到1943年春,馆陶县(卫西邱馆路以南)饿死病死2万人。八区房儿寨1440人,饿死82人,33户逃光死绝。尤其是老四区一带,更是庭院荒芜,人烟稀少,一片凄凉景象。邱馆路上桃寨据点附近几个村庄几乎成了无人区<sup>⑦</sup>。大名县仅南李庄就死1000口,孝廉、铁卜营、沙河路、小村、小湖等一些大村死人都在数百人以上,一些小村也都在几十人、上百人<sup>⑧</sup>。南乐饿死人口在1.9万以上(含卫河一、二区),饿死者的尸体无人埋葬,散落在田间、路旁被野狗争食,惨不忍睹。三区前龙卧村100余人就饿死20多口,薛集四五百人饿死八九十口,卫河西宋庄村饿死79人<sup>⑨</sup>。全冀南区人口死亡20—30万,亲历者王新镜对曲周老百姓状况这样描述道<sup>⑩</sup>:

一九四三年七、八月间,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不仅受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,野蛮的破坏,又加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然灾害,长期不下雨,颗粒未收,家家断粮,树皮都吃光了。树上的小枣没等成熟就打下下来充饥,高粱秆、玉米秆剥去皮,捣碎当饭吃,刺儿菜当主食。因失期不吃粮食,饿得人们东倒西歪,小孩饿得更可怜,吃野菜过多,胀得肚子很大,脸瘦得很小,皮包着骨头,黑得可怕,每天村里都有几口人饿死,甚至十几口人。

1943年前后鲁西冀南老百姓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,除了灾荒饥馑和疾病瘟疫因素外<sup>⑪</sup>,还有灾荒年月致人死亡的特殊因素——撑死。由于长期饥饿,身体出现变化,主要是老百姓所说“肠子饿细了”,突然有粮食吃的时候,控制不了自己,吃多了,以至于撑断肠子身亡。我们看老百姓的回忆。

威县枣园乡南辛庄张茂增:

①杨易辰:《冠北工作队总结》(一九四五年一月),谢忠厚主编: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》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4年版,第106—107页。

②山东省冠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冠县志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1年版,第37页。

③聊城市卫生志编纂办公室:《聊城市卫生志》,1991年,第109页。

④山东省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莘县志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97年版,第361页。

⑤张怀轩:《两战时期冠县的敌祸与党的经济政策》,山东省冠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:《冠县文史资料》第2辑,1989年,第53页。

⑥崔维志、唐秀娥主编:《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》,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3年版,第220—221页。

⑦河北省馆陶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馆陶县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315页。

⑧康敏:《大名县历史情况回忆》,中共大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:《大名烽火》,1997年,第115页。

⑨中共南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:《中国共产党南乐县历史》第1卷,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版,第189页。

⑩王新镜:《抗战时期曲周五、六区妇女工作中的几件事》,河北妇女联合会编印:《峥嵘岁月》(一),1983年,第317页。

⑪1943年秋天雨后鲁西冀南大量老百姓死亡,原因之一是日军“霍乱作战”所致,参见拙文:《日军“十八秋鲁西作战”中国人死亡人数商榷》,《抗日战争研究》,2013年第2期。

民国32年没下雨,收庄稼的时候,阴历七月底下了七天七夜。死人先是饿死的,后来粮食一下来,人一吃新粮食就死了,人的肠子饿细了,猛一吃,撑死了,到后来又得霍乱转筋,全村300来口子,光南头就死100多。<sup>①</sup>

清河县葛仙庄杨福旺:

逃难回来,可完了,可死人了,俺胡同里一天死两三个,撑死的。俺八叔、俺七叔都撑死了,新粮食下来,知不道饥饱了,狠吃,撑了还吃,吃死了。<sup>②</sup>

临西县临西镇庄科村刘镇家:

到(1943年)9月里,收了点新粮食,饿得人吃了之后闹肚子,有病撑得都死了,发烧,得病不长时间,三五天就死了。<sup>③</sup>

冠县贾镇后二十里铺齐玉真:

民国32年后,刚过了灾荒年,粮食下来了,就有撑死的,饿得穿心了,一吃多就撑死了。灾荒那一年,树皮树叶都勒得光光的,啥树叶子都吃,有柳叶、榆叶。<sup>④</sup>

东昌府区许营乡曹家庄曹潘氏:

民国32年,当时11岁,在潘庄、小李庄。没吃头,没喝头。七八月下了七八天雨,下了新粮食,很多都撑死了。<sup>⑤</sup>

1943年距离我们调查的时间约65年左右,65年过去了,鲁西冀南的许多老人仍然不能提起“灾荒年”“大贱年”之类的词语,一提起,他们就浑身颤抖,或者放声大哭,或者悲泣哽咽,根本说不出话来,可以想见老人们当年遭受了何等的苦难!尽管上文鲁西冀南老百姓的口述资料同质性很强,并且言语简单,但是从他们的叙述中,我们感受到1943年前后鲁西冀南灾荒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艰难!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!

[责任编辑:翁惠明 wenghm@vip.163.com]

①张茂增,男,78岁,威县枣园乡南辛庄村民,2008年1月28日访谈。

②杨福旺,男,80岁,清河县葛仙庄村民,2008年1月27日访谈。

③刘镇家,男,79岁,临西县临西镇庄科村村民,2008年8月29日访谈。

④齐玉真,女,72岁,冠县贾镇后二十里铺村民,2006年10月3日访谈。

⑤曹潘氏,女,76岁,聊城市东昌府区许营乡曹家庄村民,2008年10月2日访谈。